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逻辑路径探析

李国锋, 任凤琴* (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泰安 271018)

摘要 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 人们疾呼“保护自然”、“回归自然”,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是积极回应。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向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 其他国家的生态文明实践要求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展开现实反思;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 致力于“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归宿和战略选择,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逻辑路径。

关键词 生态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美丽中国; 逻辑路径

中图分类号 S-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3)26-10904-03

Analysis on the Logical Path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 Guo-feng et 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lege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Fac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ecological crisis, people cry of “protecting nature”, “returning to nature” and increas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turning fro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ecological practices of other countries require realistical refle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bining with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itting to “eco-oriented modernization” are logical destination and strategic choice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above is the logical path to social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autiful China; Logical path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式, 基于坚实的逻辑基础从而彰显其价值和意义。始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人类文明转向和欧美及苏东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美丽中国具有内在的一致, 更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这一逻辑归宿的鲜明体现。

1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逻辑起点

人类文明转向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人类要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 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全面发展, 必然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 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 “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 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 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 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 然而, 20 世纪 60~70 年代起加速恶化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 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关于生态危机的成因, 固然有林林总总的解说, 但最终无一例外的落脚于人类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进而导致生态危机。因此, 有必要对人类文明已有的发展形态进行梳理, 探索破解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有效方式, 寻求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1.1 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 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 人类受制于未知的自然力的统治, 对自然开发的范围仅限于农田生态系统和经济林生态系统, 自然界的生态失衡在范围和

数量上是有限和局部现象, 人与自然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了工业文明, 此时人类“真正”成了自然的主人, 工业文明在极大地稳固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的同时, 也不断地去掠夺自然和“内在地对自然的不友好”, 由此必然导致“成本外在化”。马克思在就曾深刻地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据优势, 这样一来, 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 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 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 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自然条件。”^[2] 更令人警醒的是, 马克思指出这种“断裂”存在于整个奉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之中。对此, 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戴维·佩珀 (David Pepper) 这样论述: “‘开采’资源——获得它们的价值而不考虑对未来生产率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 而成本外在化部分地是将其转嫁给未来: 后代不得不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3] 不难看出, 工业文明在创造了人类的辉煌之后, 也正在用它巨大的创造力摧毁自己, 使自己陷入不能自拔的艰难境地。面对工业文明的衰落, 人类的生态环境意识自上世纪中后期开始觉醒, 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和拓展。

1.2 人类文明有效途径的探索 人类为了永续发展, 必须要超越传统文明及其发展模式, 探寻一条新的文明模式和发展道路, 绿色、循环、生态发展正成为人类发展的新趋向。以人实现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生态文明, 可能不是一种必然然而意义上的唯一性选择, 也不是一种自然而然意义上的唯一性结果, 但是在后现代文明时代背景下对人类文明未来可能状态的激情想象, 是对人类以往工业化与城市化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性超越。这种超越意味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转向, 指明了人类未来可能的发展道路, 由此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

基金项目 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资助项目“生态农业建设的伦理问题研究”(J13WA15); 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济南市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学研究”(13CJB01)。

作者简介 李国锋(1976-), 男, 山东菏泽人, 讲师, 博士生, 从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 E-mail: ozlfg@163.com。* 通讯作者, 任凤琴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生态伦理学研究。

收稿日期 2013-08-06

2 国外生态文明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国外生态文明模式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真正持续发展。纵览世界发展,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经典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比较丰富。在当今“一球两制”的现实背景下,上述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来说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2.1 西方社会生态文明模式破析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即使不能说已经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更为发育成型的“生态文明”要素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可以说,在当代欧美国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生态文明”的现象碎片或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征兆迹象。^[4]但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本的逐利本性以及市场竞争的压力注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竭力使维护生态环境质量的成本“外部化”,不仅侵害了国内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生态环境权利,而且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输出”或“转嫁”。正是基于上述理论,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提出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危机”理论,即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存在着“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双重危机,而生态危机清晰地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另一学者詹姆斯·杰克逊在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进行阐释时,也非常前瞻性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与自然的保护不相容的”,并且提出了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性解决思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控制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印度籍德国学者萨拉·萨卡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增长”所依托的理论假设都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失败正变得显而易见”。同样“确信无疑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正在走向失败”。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批评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的“生态文明”的血腥性质和非生态本质。

2.2 在中国社会主义语境背景下探讨“生态文明”模式的必要性 与此相对照,社会主义理念蕴涵着更多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建设是有计划的而不是盲目发展——因而可以对资本与市场的扩张本性与经济理性本性进行必要的限制。就此而言,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应当拥有高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形态,甚至可以说,“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应有内涵^[5]。美国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巴里·康芒纳谈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生态的迫切需要之间的基本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有超越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但对照一下前苏联、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的理念并不能保证自动建立与之相对应的生态友好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框架。苏联执政党和政府对环境保护非常关注,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水源和空气的污染物容许浓度标准的国家。更

重要的是,这些都是目前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实施的最严格的标准”,^[5]可是这一切都没能有效地阻止生态环境破坏:高耗低效的高增长造成资源空心化和严重的资源浪费;盲目的开发、改造与建设导致气候土壤干化和大面积水土流失。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同时期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恶化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上述国家在价值体系和基本制度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向,但这一事实一方面不足以说明他们已找到了更为适合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或生态文明发展的模式,另一方面也清晰地告诫世人在经典社会主义话语下讨论生态文明已没有意义。

鲜活的事实一再警戒世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必须对业已出现的国外形形色色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理论反思和升华,在人类未来文明形态与实现路径的意义上进行超越性的想象与设计。

3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归宿与选择

“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归宿和战略选择。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注由来已久,“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元素成份不断累加、战略地位日渐提升。从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到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多次重申和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要素。从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号召“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无疑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的更加凸显和战略地位的提升。这一点足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深刻表明“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归宿和战略新方向。

3.1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选择 科学发展观是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核心的内容,寻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发展战略是科学发展观的本意和要义。无论是5个“统筹”还是4个“必须”的论断,都是密切围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而展开的,要求发展观念、经济增长方式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实现实质性超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在生产方式上追求的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生活方式上追求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明确反对“异化消费”,变“黑色”发展和崛起为“绿色”发展和崛起,正如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的那样,要“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从这一意义上说,“绿色”发展道路也就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选择。

3.2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的本质体现 马克思在展望未来社会的文明形态时这样说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

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 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6]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就在于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和自然的解放与高度发展。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现“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身关系四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又是缺一不可的,其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整个社会文明体系的基础。“人们实现四大和谐发展的成果,以及此条件下所建立的伦理、规范、原则、方式及途径等成果的总和,可以称之为广义的生态文明,也可以称之为绿色文明。”^[7]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议题,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战略新选择。走和谐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走生态文明的道路。

3.3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上接第 10903 页)

大自然的规律始终是它的核心和灵魂。

云南先民很早就懂得顺应农时,趋时避害,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狩,通过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的方法,采取了多种方式和手段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如间作、套作、混作的运用等,这样的方法放在今天也还是非常适用的。他们创造的 24 节气、72 候、农事俗语等,仍然沿用至今。

在云南的农业生产中,施肥是废弃资源物质化、实现农业生产系统内部物质良性循环的关键一环,尤其是粪肥的使用,使废变成了宝,形成了循环利用的有机农业。还有提倡节俭,抑制无限止的贪欲,这些对今天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5 结语

云南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云南各族人民在各自的居住地区,因地制宜,积累了许多优良的农业耕作技术经验,取得了卓越的技术成果。如白族、壮族、傣族等民族的坝区水稻精耕细作,哈尼族、景颇族等族的山区梯田水稻耕作技术,佤族的旱稻耕作技术,彝族、苗族、瑶族、傈僳族等族的山区旱地种植包谷、洋芋等耕作技术,都有自己的独创性和

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8]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倡导给自然以平等态度和充分的人文关怀,关注和尊重生态环境的存在及其意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倡导主动遵循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禁止对自然无节制的攫取;倡导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实践一再证明,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良性发展,才能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梦想,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1.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2.
- [3] 戴维·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 刘颖,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36.
- [4] 邹庆治.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种术语学解析[J]. 绿叶,2008(2):99.
- [5] E·费道罗夫. 人与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进步[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6:6,96.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97.
- [7] 刘思华.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89-490.
- [8]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

卓越成果。云南人以悠久的农耕稻作历史、传统的农业耕作方法和完善的水利设施系统而文明,在云南乃至中华农业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在当今科技如此发达的环境下,云南农业的发展必然要同优秀的传统农耕文化相结合,才得以走出一条富有自己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保护、传承和利用好传统的农耕文化,探索出一条科学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 [1] 张波,樊志民. 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 [2] 胡泽学. 三晋农耕文化[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 [3] 夏学禹. 论中国农耕文化的价值及传承途径[J]. 古今农业,2010(3):88-98.
- [4]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景颇族文化大观[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73-74.
- [5]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 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二)[C].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3-4.
- [6] 李昶罕,秦莹. 农耕文化视野下的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3):1-5.
- [7] 张海翔. 云南农耕文化的局限性[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6):1-3.
- [8] 张海翔. 云南农耕文化的当代价值[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5):1-3.